

非京籍青年社会流动与城市认同研究报告 ——基于京籍常住型青年与京籍迁入型青年的对比分析

郭元凯 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摘 要：根据北京团市委 2016 年在全市 16 个区 150 个街道的 18-35 岁青年中部署完成的“北京青年城市流动性调研”的调查数据，以京籍常住型青年和京籍迁入型青年作为比较对象，本文对非京籍流动青年的发展现状和流动性特征、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和“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对非京籍青年流动性带来的直接影响进行了全面研究，以及有效推进非京籍青年的主动合理流动并获得更好的流动机会和流动空间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非京籍青年 社会流动 青年发展 城市认同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北京市聚焦首都城市战略新定位，以国际一流的城市管理标准推进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强以流动人口为重点的首都人口规模调控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深入了解非京籍流动青年的发展现状和流动性特征、全面分析北京人口调控政策和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对非京籍青年流动性带来的直接影响、有效推进非京籍青年的主动合理流动并获得更好的流动机会和流动空间，本文运用北京市团市委于 2016 年实施完成的“北京青年城市流动性调研”的调查数据进行全面的量化分析。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城市流动性调研”于 2015 年 12 月开始部署并于 2016 年完成，是在全市 16 个区 150 个街道的 18-35 岁青年中开展。其中，京籍常住型青年为 2759 份（A）、京籍迁入型青年为 835 份（B）、流动型青年为 5002 份（C）。其中，“80 后”比例占总体的 72.1%，“90 后”占比为 27.9%。从三类青年的“90 后”占比情况看，迁入青年仅占 9.4%，常住青年及流动青年所占比例则分别为 31.1%和 29.2%，年龄的年轻化程度明显高于迁入青年（见表 1）。根据研究主题，本文重点分析非北京市户籍且在北京居住半年及以上的常住人口的流动青年群体（以下简称“流动青年”）。为了更好发现非京籍青年的流动性特征和发展境遇，本文将目标人群与京籍原住民青年（以下简称“常住青年”）和京籍迁入型青年（以下简称“迁入青年”）进行了对比分析，深入探究三类人群之间的差异性等。本研究结合该调查数据，系统了解非京籍流动青年的基本特征、家庭状况、学习工作情况、生活现状、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价值观以及对国家政策的认同度等内容，梳理非京籍流动青年的流动性特征、群体发展状况以及群体需求等内容，为党政部门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调控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为相关部门创新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提供路径指引。

收稿日期：2018-11-1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18 年度“皮书系列”课题“2018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中国青年发展蓝皮书 2018）”（课题编号：PSXL201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元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青年发展研究、青年社会流动研究、青年参与研究；邓希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年政策研究、青年发展研究、青年工作研究。

34

表 1 调研群体中三类青年年龄层次比较 (%) (N=8596)

类别 \ 年 代	85前	85后	95前	95后
京籍原住型青年	42.0	26.9	23.9	7.2
京籍迁入型青年	69.8	20.9	8.4	1.0
非京籍流动型青年	38.6	32.2	25.5	3.7
合计	42.7	29.4	23.3	4.5

一、非京籍流动青年的社会流动和职业发展的现状和特征

(一) 常住外来人口开始回落，2016 年迎来流动人口双拐点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的城市公共交通、卫生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等大大改善，城市容纳人口能力迅速提高，流动人口数量也不断升高。表 2 的数据显示，从 2008 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一直在增长，由 1771 万增至 2016 年的 2172.9 万，增加了 401.9 万，增长了 22.7%；全市常住外来人口总量在 2015 年达到最高峰，为 822.6 万，比 2008 年增加了 36.1 万，增长了 52.1%。可见，常住外来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区人口增长速度。从常住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看，北京市在 2014 年达到峰值 38.05%后迎来了拐点。2016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出现双拐点，常住外来人口总量和在常住人口中占比双双下降，增量增速均转为负增长，全区常住外来人口比 2015 年减少 15.1 万人，增速为-1.8%，占比继续下降，降幅为 0.86 个百分点。

北京市非京籍流动人口出现双拐点的局面，既是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各项措施推进的积极成果，也预示着维持流动人口双拐点的局面越来越难，越到后面流动人口净流出工作难度更大。根据北京市确定的 2020 年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300 万人以内的目标，现在仅有不到 130 万人的空间，意味着北京在人口流动方面将出台更加严格的措施，这又会对非京籍流动青年的流动性和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表 2 2008-2016 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发展变化情况

年份	全市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外来人口	常住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
2008 年	1771.0	541.1	30.55
2009 年	1860.0	614.2	33.02
2010 年	1961.9	704.7	35.92
2011 年	2018.6	742.2	36.77
2012 年	2069.3	773.8	37.39
2013 年	2114.8	802.7	37.96
2014 年	2151.6	818.7	38.05
2015 年	2170.5	822.6	37.90
2016 年	2172.9	807.5	37.16
2017 年	2170.7	794.3	36.61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局 (http://www.bjstats.gov.cn/tjsj/cysj/201511/t20151109_311727.html)。

（二）职业流动频率较高，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不明显

从自身的职业流动情况来看，非京籍流动青年的职业变动频率相对较高。数据显示，近三年，被调查群体中青年换过两次及以上工作的比例为 27.6%。其中非京籍流动青年近三年内换 2 份及以上工作的比例为 31.4%，显著高于迁入青年（16.7%）和原住青年（23.1%）。可见，流动青年的职业流动性较大，不但高于北京市全部青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与京籍原住型青年和京籍迁入型青年有一定差异。

从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看，三类青年群体中从事务工的人数比例均出现大幅下降。此外，流动青年与其父辈的职业相似性较高。以流动青年及父辈的工作单位性质作为统计标准，图 1、图 2 和图 3 的结果显示，流动青年与其父辈所在单位的相似度较高，其折线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基本一致。其中，流动青年中从事个体经营（个体户）的比例非常高，其父亲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数比例也高于原住青年和迁入青年的比例；在其他单位性质上，流动青年代际之间的差异也要小于其他两类人群（见图 3）。由此可见，流动青年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变化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父子同业”现象，表明流动青年的代际流动并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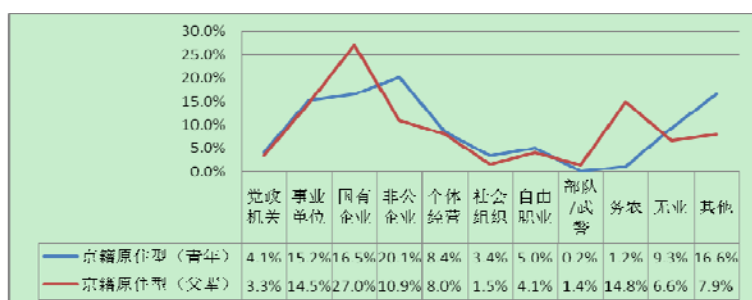


图 1 京籍原住型青年与其父辈单位性质相似度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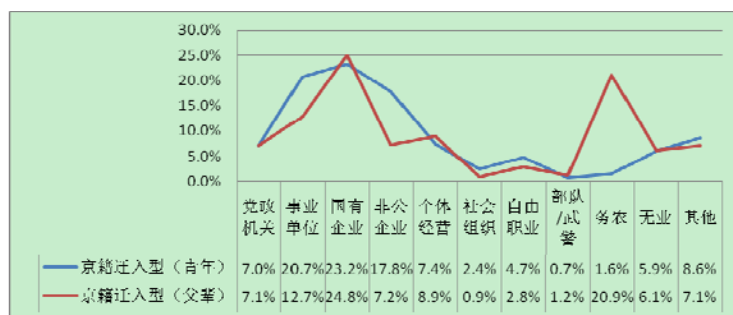


图 2 京籍迁入型青年与其父辈单位性质相似度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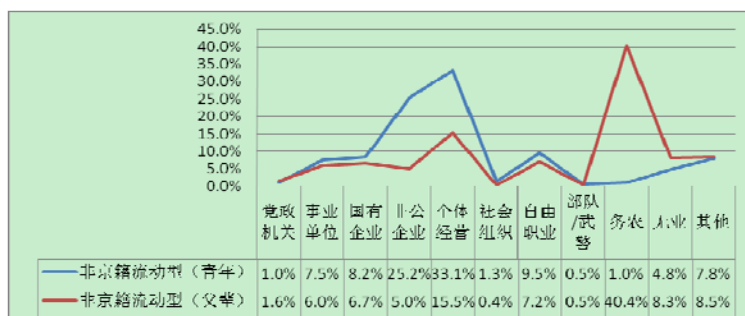


图 3 流动青年与其父辈工作单位性质相似度折线图

（三）流动时间较长，就业成为流动主因，举家迁移现象凸显，离京意愿较低

从流动时间看，流动青年来京时间较长，超过5年的比例很高。其中，来京时间在3-5年的比例为22.7%，5-10年的为27.3%，超过10年的比例超过19.6%。可以看出，大部分流动青年在北京生活工作已有相当长时间，已经基本适应了北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方式等。以北京作为流动目的地的主要原因，排在首位的是就业创业。其中，非京籍青年中流动到北京找工作的比例为59.1%，到北京创业的比例为17.1%，排在第三位的是继续自己的学业，而这一部分流动青年很大程度上会在完成学业后继续留在北京工作或生活。还有部分流动青年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婚姻关系，这印证了大部分已婚流动青年与配偶一起在北京工作的主要结论；大量研究表明，伴随着流动青年进入到了生育年龄，原有的单一流动的模式将会发生改变，举家迁移现象会更加凸显。

从流出北京的意愿看，流动青年在短时期内不会离开北京。尽管面临着北京新政对流动空间的收窄，流动人口面临着严重的挤出效应，但流动青年的强烈意愿仍是选择在北京工作与生活。调查结果显示，5年之内不离京的比例为39.4%，三年内离开北京的人数比例仅为6.8%，想一直在北京的非京籍流动青年比例为14.1%。流动青年在未来五年中仍然倾向于选择继续在北京工作、上学（31.1%）或者在北京创业（18.4%）。虽然国家提出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但未来五年真正选择到其他两地发展的人数比例不足2%。此外，从北京市部分区县的对比来看，有些区县的非京籍青年流动频率相对较低，也会加深他们定居北京的意愿。数据显示，朝阳流动青年的职业变动平均数为1.22个，海淀流动青年的为1.08个，丰台流动青年的为1.06个。这说明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实际落地以及政策目标人群的实际认可之间，尚存一定的距离，需要相关部门在政策实施中持续发力。

（四）体制外就业占主体，体制内就业较少，个体经营及低端市场从业占比高

图4的数据显示，非京籍流动青年大多是在体制外工作（83.3%），明显高于常住青年（64.2%）和迁入青年（49.1%），其中在非公企业中工作的比例为25.2%，个体经营的比例高达33.1%。在三类青年中，迁入青年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最高，比例超过了半数以上（50.9%），而常住青年及非京籍流动青年的比例则分别为35.8%和16.7%。从就业形态可以看出，个体经营相对自由，一般不需要很大的战略规划，并且由于个体经营就业形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吸引了大批流动青年就业。此外，北京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高，也为流动青年在北京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见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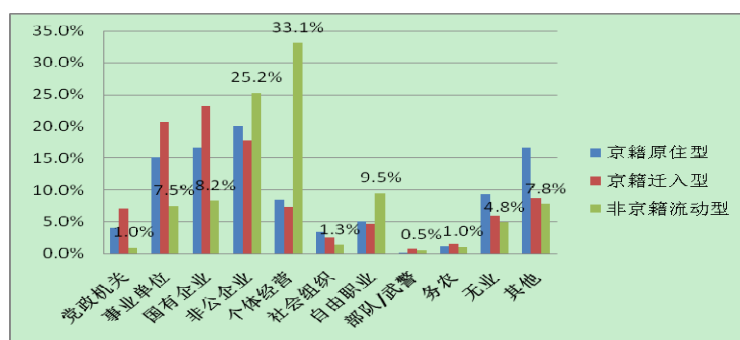


图4 北京市三类青年的工作单位类型对比图

表 3 北京市产业、行业所占生产总值比重及与流动青年所在行业比例（%）

产业及行业分类	比重	非京籍流动青年所占比重
第一产业	0.4	
第二产业	19.0	
第三产业	80.6	
农、林、牧、渔业	0.4	0.9
工业	15.3	10.0
建筑业	4.1	4.2
批发和零售业	8.9	16.1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3	3.9
住宿和餐饮业	1.5	11.7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3	9.9
金融业	16.6	2.2 ↓
房地产业	6.3	2.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0	4.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2	2.2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9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6	——
教育	4.8	2.2
卫生和社会工作	2.5	3.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	2.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2	2.1
其他行业	——	22.3

资料来源：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非京籍流动人口的数据为本课题自行搜集的数据 (N=8596)。

从上述统计资料及调研数据资料的对比得知，非京籍流动青年所在行业以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行业为主，具体表现在批发零售业（16.1%）和住宿餐饮业（11.7%）等。在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中，非京籍流动青年的比例则相对较低。分群体来看，原住青年与迁入青年主要从事的行业均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批发零售业两者所占的比例则分别是 5.3%和 6.0%。这就表明三个不同青年群体的行业分布有着明显差异。近年来，北京市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先导和突破口，提出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中就有“以业管人”的具体实施形式，也必将对非京籍青年的社会流动带来极大的直接影响。

（五）职业阶层分布相对均衡，工资收入整体不高

近年来，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多元化产业结构日趋明显。根据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及城市规划的要求，北京市将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新兴金融、文化创意三大主导产业，全面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实现由“北京制造”向“北京创造”战略目标的成功转换。从调查数据看（见表 4），流

动青年的职业阶层分布相对均匀，流动青年中不乏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这两类阶层的比例共计为15.7%。其中流动青年中单位负责人的比例为5.5%，远高于原住青年（2.3%）和迁入青年的（1.4%）。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主要与流动青年中相当多的人是个体经营户有关。在其他职业阶层上，这与其他两类青年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异性。流动青年最大的阶层仍是普通办事人员，比例为25.6%，专业技术人员也超过了18.7%。

表4 北京市流动青年与其他两类青年职业阶层分布对比表(N=8596)

类别	单位负责人	中层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临时工	其他
原住青年	2.3%	9.8%	17.4%	37.2%	6.1%	27.1%
迁入青年	1.4%	16.3%	27.3%	33.8%	3.8%	17.4%
流动青年	5.5%	10.2%	18.4%	25.6%	15.2%	25.1%

《2014 年度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数据显示，2014 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 77560 元，月平均工资为 6463 元。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14 年北京市全部流动青年的平均工资为 49261.52 元，折合月工资为 4105.13 元，比北京全市的工资低了近 36.48%，但与其他两类青年相比，流动青年的工资收入居于中间地位。其中，原住青年的平均月工资为 3447.24 元，迁入青年的平均月工资为 5898.23 元。此外，超过七成流动青年在每月的工资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在其他收入来源中，排在前三位的是投资各类金融产品（7.6%），兼职（8.5%），以及开网店、微店（5.5%）。虽然有这些额外的收入来源渠道，但可以看出这些渠道要么需要有原始投资资金，要么拥有一门技能等。但是，从流动青年的文化水平和工作类型看，他们的自有资金并不丰富，初高中水平的学历也大多没有一技之长。由此可以推定，流动青年要适应北京生活就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

（六）社会风险防范意识不足，社保参与率较低

相比老一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青年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城市中工作生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享受现代城市带给他们的便利；权利意识逐步增强，对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重要手段，我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工作单位要按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流动青年中有30.5%的人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还有3.0%的流动青年不知道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与原住青年（81.9%）和迁入青年（86.1%）相比，流动青年劳动合同签订率（66.5%）低出许多。从表5可以看出，流动青年的权益保障严重不足。这一方面与他们自主经营、缺乏劳动合同签订意识有关；同时，部分企业为了推卸企业社会责任，故意不与流动青年签订合同的行为也难辞其咎。此外，流动青年的带薪休假享有量要远远低于京籍原住青年。

社会保障作为流动人口抵御社会风险的重要机制，对于个人在城市中的长远发展以及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与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调查发现，与权益保障情况相似，流动青年的社会保障参与率并不是很高，并且与京籍青年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五险”方面，流动青年群体的社会保障参与率为57.8%，原住青年和迁入青年的社会保障参与率分别为81.9%和87.2%，比流动青年高出了近30个百分点。可见流动青年的社会保障情况并不好，在现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缺少社会保障很容易使该群体暴露在社会风险之中。

表5 北京市各类型青年的劳动合同签订及带薪年假状况

	您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			您是否有带薪年假		
	是	否	不知道	是	否	不知道
京籍常住型青年	81.9%	14.8%	3.3%	72.8%	22.8%	4.4%
京籍迁入型青年	86.1%	13.0%	0.9%	80.3%	18.2%	1.5%
非京籍流动青年	66.5%	30.5%	3.0%	52.5%	43.6%	3.9%

（七）职业提升动力一般，对未来发展有良好预期

数据显示，流动青年的职业提升动力整体上弱于常住青年和迁入青年，迁入型青年的职业提升动力最充足，也更愿意给自己“充电”。流动青年参加工作后，自学新知识、新业务技能的比例为 53.9%，常住青年和迁入青年的比例分别为 53.8%和 67.5%。由于工作性质原因，流动青年中参与短期培训的比例（45.9%）也低于其他两类人群。此外，流动青年对耗时较长的继续教育方面没有太大兴趣，比例仅为 18.9%，与其他两类群体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在对公司外派京外工作的态度上，三类青年都比较看重待遇（常住青年为 46.5%、迁入青年为 45.0%、流动青年为 63.3%），但流动青年愿意外出的比例明显高于京籍常住青年和迁入青年。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流动青年流动性的特征以及外出以改善经济收入为主的研究结论。虽然流动青年的职业提升动力不足，但并不妨碍他们对未来生活有着良好的预期。流动青年同意及非常同意自己家庭会过得越来越好的比例合计为 83.9%，认为自己也会过的越来越好的比例高达 84.1%，这与常住青年和迁入青年的未来预期大致相同。这表明，虽然目前的生活与工作存在着一定困难，但北京市流动青年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还是抱有极大的信心。

二、非京籍流动青年的城市认同和社会交往的现状与特征

（一）城市认同感一般，社会阶层自我定位不高

调查显示，流动青年对北京市的城市认同感要比其他两类群体的认同感低。数据表明，非常喜欢北京市的流动青年只有 13.6%，常住青年的比例却约占到整个群体的一半左右（49.6%），迁入青年的比例也接近 30%。虽然有 56.3%的流动青年认为北京市要比其他城市好，尤其是比其他城市有“文化底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对北京市的认同度高。其中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流动青年从内心就认同“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这一说法（30.0%），另一方面，北京常住青年也存在一定的排外情绪。调查显示，北京常住青年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这一说法的比例整体上高于认同“北京是全国人的北京”这一说法（见图 5）。

从社会阶层的自我定位看，流动青年的自身定位相对较低。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北京市虽然很好，但北京更多是一个“宜业”不宜居的城市，从图 6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流动青年虽然认同北京市的文化和城市发展状况，但他们更多的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看待北京，他们中许多人认识自己只是北京市的过客或暂时寄居北京，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大多数非京籍流动青年认为自己在北京市处在社会的中下层或者下层，尤其是感觉自己处在下层的流动青年比例（23.9%），差不多是迁入青年和常住青年比例的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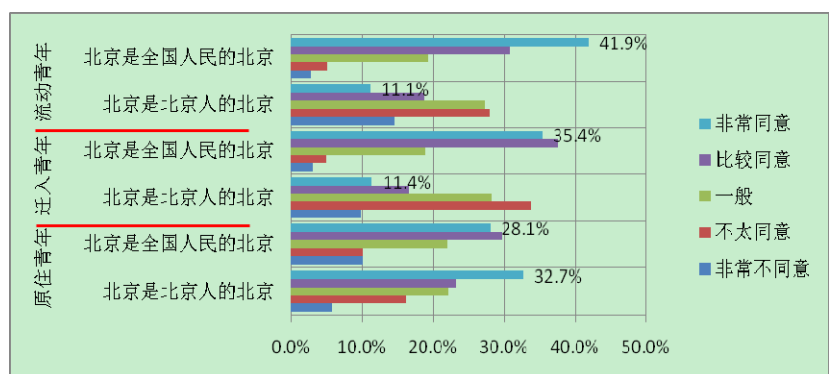


图5 三类青年对北京城定位的认知情况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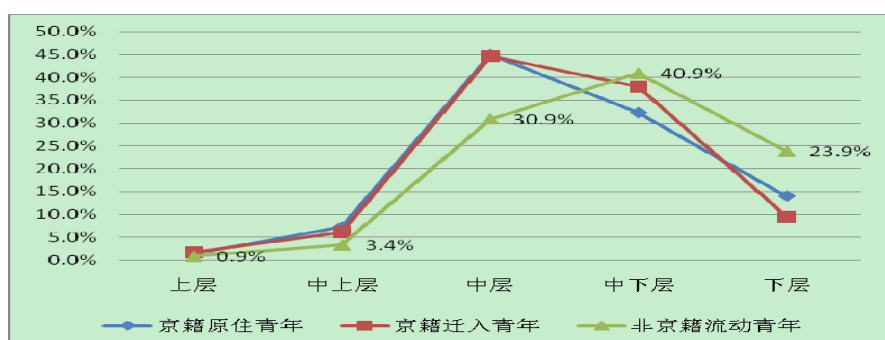


图6 流动青年与其他两类青年社会阶层的自我认知对比

（二）对北京各方面的评价整体一般，对工作发展环境的评价优于对人居环境及社会地位的评价

在对被调研北京各类青年个人发展环境的主观评价调查方面，本文从经济、社会地位、教育机会、工作环境、居住环境以及民主权利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三类青年对北京市各方面的评价整体一般（均值为3.21分，满分为5分）。在分群体方面的评价中，迁入青年对北京市的各方面的评价最高（ $M_{\text{迁入}}=3.53$ 分），其次是流动青年（ $M_{\text{流动}}=3.23$ 分），排在最后的是原住青年，该群体对北京发展环境的主观评价分值为3.14分。

表6 三类青年对北京市发展环境的主观评价对比表

	经济 收入	社会 地位	教育 机会	工作 稳定	工作 前景	社会 福利	人居 环境	工作 环境	民主 权利	总体 评价
京籍原住民	2.77	2.94	3.23	3.25	3.09	3.08	2.86	3.22	3.13	3.14
京籍迁入型	2.91	3.10	3.43	3.51	3.27	3.28	2.89	3.38	3.36	3.35
非京籍流动青年	3.04	2.97	3.05	3.26	3.20	2.99	2.91	3.32	3.16	3.23
整体	2.94	2.97	3.15	3.28	3.17	3.05	2.89	3.29	3.17	3.21

注：主观评价分值共有5个分值，1分为最低分，5分为最高分。

在各分维度方面，各类青年对北京市的工作发展满意度最高，这其中包括工作稳定性、工作前景和工作环境，他们对社会地位、人居环境以及经济收入的满意度最低（见表6）。在流动青年看来，他们对工作

稳定性、工作前景以及工作环境的得分分别为 3.26、3.20 和 3.32，但人居环境(2.91)以及社会地位(2.97)的打分均较低。这从侧面反映了青年留居北京更多是因为工作原因，尤其是看重北京工作环境以及工作的稳定性等。

（三）对政策的认可存在选择性，有损自身利益的政策认可度偏低

政策的制定与出台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任何一个政策都有可能对某些成员或某些方面带来利益损失。流动青年作为北京市常住人口的一部分，为北京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北京市落实党中央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相关决议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流动青年的生存发展。调查显示（见表 7），流动青年比较认可当前北京市出台的诸多政策。比如，大部分流动青年支持行政事业单位搬迁至通州政策、支持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支持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支持棚户区改造政策等等。但在涉及到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上，流动青年则比其他两类青年表现出一定的消极态度。比如，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太支持户籍地高考政策、小客车摇号政策以及批发市场关停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与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子女教育等密切相关。由于流动青年较多从事个体经营，区域性批发市场就对于支持他们在北京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关停批发市场并进行小客车摇号，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此外，大部分流动青年已经有了子女，子女教育已经成为他们除了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尤其关注教育公平，户籍地高考政策的实施势必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表 7 非京籍流动青年对北京市相关政策的态度

项目	非常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一般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我不关心
行政单位搬通州	1.1%	5.7%	31.1%	28.4%	21.3%	12.4%
空气污染协同治理	1.0%	1.9%	13.4%	27.5%	53.5%	2.6%
户籍地高考政策	8.1%	10.1%	26.9%	23.1%	26.5%	5.2%
主城区人口疏解	1.5%	4.4%	29.2%	31.2%	28.3%	5.5%
小客车摇号政策	8.0%	9.6%	28.6%	24.5%	22.5%	6.8%
单双号限行	4.8%	7.8%	21.3%	27.9%	33.6%	4.7%
积分落户政策	3.6%	6.1%	27.1%	28.3%	28.6%	6.3%
批发市场关停	6.9%	16.2%	33.4%	19.4%	16.3%	7.9%
棚户区改造	1.3%	3.3%	28.7%	27.7%	29.1%	9.8%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停批发市场这一项政策上，京籍原住青年非常不同意的比例比流动青年还高。数据显示，原住青年非常不同意关停批发市场的比例为 10.3%，而流动青年为 6.9%、迁入青年的比例为 4.7%。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可能批发市场对于满足原住市民日常需求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同时，从原住青年角度来看，从批发市场中购买物品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批发市场的关停对于重塑新的习惯也是一个挑战。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流入地居民与流入人群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但两者在城市中更多的是共存关系。

（四）“朋友圈”以亲缘、业缘为主，交往呈现“内倾性”问题

当前，“朋友圈”已经成为青年比较熟悉的一种社交工具，其实质就是社会交往活动在网络媒介上的延伸与发展。流动青年的“朋友圈”相对较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青年的“朋友圈”主要集中在亲人(19.3%)、老乡(22.8%)以及同事(36.4%)群体之间，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活动相对较少。也就是说，流动青年“朋友圈”主要是以亲缘和业缘建立起来的。这与原住青年和迁入青年的情况有些不同。原住青年中除了亲缘

之外,“学缘”(38.0%)是他们构建朋友圈的重要途径。迁入青年中以地缘为中心的朋友圈并不多,仅为4.1%,其他交往群体的比重则相对平均。

总体上来看,虽然流动青年相比老一代流动人口中的交往“内倾性”问题有一定弱化,但流动青年还是选择那些与自己社会关系较近或社会地位相似的群体进行交往,如老乡、同事等。这一问题在迁入型青年虽然有所体现,但两者略微不同。数据显示,迁入青年中交往最多的除了同事之外(34.4%),家人及亲戚是他们交往的重点(31.6%),这与流动青年是有一定区别的。可能的原因是,迁入青年的整体年龄高于流动青年,且他们经济收入比较好,已经形成了举家迁移的态势,并且这部分青年在北京工作更多的是凭借自身的专业技能或学识水平等,老乡在帮助其获得北京户口时的作用相对较少,使得他们更愿意选择家庭内交往。流动青年受制于制度因素和经济压力的制约,还停留在个人迁移或核心家庭的迁移模式。地缘群体在其进入城市时发生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作用,使得他们还是会将老乡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对象。数据还显示,大部分的流动青年在北京大约有5个比较好的朋友,但是这些人中是原住民的只有不到2人,可见该群体与拥有本地户籍的北京市民接触不多。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社会交往的“内倾性”延缓了流动青年对流入地风俗和习惯的了解速度。长时间不与本地青年进行接触,容易导致群体间的疏离感,造成事实上的社会隔离状态。

(五) 社会交往的主动性有所改善但仍有待提高,社会距离感明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交往实际上是一个交换的过程,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个体的主动性更加重要。调查结果显示,流动青年社会交往的主动性虽然有一定改善,但总体看来还是相对较差。以婚恋情况为例,大部分流动青年的恋人或者配偶是由别人介绍认识的,这一比例超过了48.1%,其中由家人亲友介绍的比例为13.7%,通过自己主动接触异性的比例为37.1%,这还要剔除由单位或者各类组织专门举办的联谊活动或兴趣小组。这就充分说明流动青年的社会交往主动性有待提高。通过后续的访谈发现,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有个人性格的原因,缺少交往平台、交往环境、交往机会也是重要原因。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分阶段的,首先是经济融合,这是融合的基础;其次是社会融合,体现在流动人口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最后是心理融合,也最难达到和实现。三者相互递进、相辅相成。流动青年社会归属感相对较低,心理融合状况不太理想,甚至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北京只是“北京人”的北京的消极心态。在对流动的社会距离的主观调查中发现,接近20%的流动青年认为北京原住民对外地人很排斥,表明他们的社会距离感明显。

三、促进非京籍流动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继续实施青年人才培养工程,多渠道提升流动青年的职业技能

北京市“十三五”规划提出,在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基础上,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形成“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力推进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经济结构的转变离不开青年高端人才的积极贡献。但是,当前流动青年的教育水平及职业技能水平,都很难满足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需求。这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需要继续实施青年人才工作,创新工作途径,多渠道提升流动青年的职业技能。针对流动青年就业创业问题,依托建立青年创业孵化阵地,建立健全政策咨询、信息服务和跟踪帮扶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引导流动青年理性创业;开

展“青春创业导师”项目，举办青年创业大赛等活动，做好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的选拔、培养和激励；还可以结合人口调控的大背景，鼓励农村流动青年回乡创业致富，并对返乡农村创业青年进行专门辅导与培训。

（二）搭建社交平台，扩大青年“朋友圈”，促进青年的城市融入进程

研究表明，非京籍流动青年的社会交往面相对较小，朋友圈较窄，且存在交往“内倾性”等问题，从而使流动青年对城市的认同感较低，社会隔离现象也较为明显。针对流动青年社会交往问题，要尽快形成多主体的社会支持体系，政府部门依托社会力量及各类群团组织等，开展流动青年婚恋交友、组织联谊等活动，扩大流动青年的交往面，提高流动青年的交际能力。针对流动青年城市认同问题，政府部门及社区等要加大城市的宣传力度，将与流动青年发展相关的党政方针、政策指南进行全面、易懂和实用的宣介活动，充分保证他们社会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的相关权利，尽快促进该群体的城市融合。要加大流入地原住民的教育力度，大力宣传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帮助他们转变观念，减少对流动人口的排斥。

（三）改革帮扶模式，由帮扶青年个人转变为帮扶青年家庭

当前，流动青年的流动模式从以往单一的乡—城流动，逐渐转变成城—城、乡—城流动并存的局面，举家迁移及夫妻共同迁移的现象也较为明显；同时，超过半数流动青年已经生育子女，父母逐渐到了退休年龄，父母养老以及子女教育问题使得缺少社会资源的流动青年的负担更大。因此，传统帮扶模式中单纯对流动青年个人的帮扶就显得力道不足，这就要求各级组织需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由帮扶青年个体逐步转变为帮扶青年的家庭，加大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合作力度，尽快建立其流动青年家庭支持系统，从积极发展的角度扶持流动青年及其家庭在北京的工作与生活。

Research Report on Social Mobility and City Acceptance for Non-Beijing Native Youth

——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eijing Native Youth and Migrant Youth with Beij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Guo Yuankai Deng Xiqu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from the “Research on Beijing City Youth Mobility” arranged by Beijing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2016, and conducted among youngsters from 18 to 35 years old in 150 communities of 16 districts in Beijing, this article, regarding the Beijing local youth and migrant youth with Beij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s comparative factors, conduct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non-Beijing native youth in the aspects of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floating features, the direct impact on the non-Beijing native youth brought by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of Beijing City and the “Non-capital function” relieving polic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effective promotion of positive and reasonable migration for non-Beijing native youth and getting better floating opportunities and floating space for them.

Key Words: non-Beijing native youth; social mobility; youth development; city acceptance

责任编辑 纪秋发